

## 荀子兵學理論之齊魯學基礎

林素英

### 摘要

戰國晚期趙國之荀子，學宗孔氏，服膺儒家「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之使命，當有機會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時，乃極力倡議王者之兵，載在〈議兵〉。觀〈議兵〉之宗旨，多承「孔子三朝記」〈用兵〉等篇之相關思想，與孔氏魯學因承之原委值得探究。復以荀子游學稷下多年，躬逢稷下學士整編多部兵書之盛事不久，故而號稱兵學權謀始祖，且影響後世兵學極為深遠之《六韜》，對積極好學之荀子尤應具有吸引力。戰爭既然無法避免，則荀子如何從《六韜》吸取齊學精華以求當世之用，自是學宗孔氏，且以務實為本的荀子所關心。職是之故，本文旨在以〈議兵〉為核心，探究荀子如何運用〈用兵〉等篇與《六韜》之齊魯學思想，以建構其兵學理論。

關鍵詞：荀子兵學理論、齊魯學、議兵、孔子三朝記、《六韜》

---

2017/2/19 收稿，2017/5/13 審查通過，2017/5/21 修訂稿收件。

\* 林素英現職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 Xunzi's Military Theory and Studies of Qi-Lu

Lin Su-ying

### Abstract

Xunzi, born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s a follower of Confucius school of thought whose goal is “to assist the sovereign, to follow the law of Yin and Yang, and to promote civilization through education.” Xunzi celebrates the Confucian benevolent virtues as exemplified by the great sage king during his interview with the king of Zhao Xiaocheng (趙孝成王), which is later recorded in the article of “Yibin(議兵).”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Yibin” and Confucius school of thought as in “Confucius sanchoji (孔子三朝記)” and “Yanbin (用兵).” Xunzi in his life time travels and stays in Jixia (稷下) for many years, influenced by several military books collected by local scholars, and especially attracted to *Liantao* (六韜).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how Xunzi builds his military theory as showcased in “Yibin (議兵)” on the basis of Qi-Lu political thinking and culture such as in “Yanbin” and *Liantao*.

Keywords: Xunzi theory of military science, studies of Qi-Lu political thinking and culture, Yibin, Confucius sanchoji, *Liantao*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一、前言

人生天地之間，仰賴天地萬物而生，因而凡所行動亦應仿效大化流行，以及萬物生滅之原理而順應之。相應於此，自有人類以來即有戰爭存在，只是戰爭之規模、類型有別而已。由於戰爭乃改變歷史的重要關鍵，因此如何備戰、應戰，乃至於征戰，都成為有國者必須嚴肅對待之大事。

搜尋古代文獻，〈皋陶謨〉追記堯舜時期已運用禮與刑主從相輔的微妙關係，但該主題尚未被當做君臣研議之核心。君臣具體討論「大刑甲兵」之問題者，一般文獻則有《大戴禮記》「孔子三朝記」中的〈用兵〉以及《荀子》〈議兵〉，其餘多屬兵書一類之作。兵書類作品，除卻號稱兵學之祖的《六韜》以文、武二韜為首，<sup>1</sup>因談論政治作戰哲理而涉及禮義與兵刑問題外，僅有《司馬法》（又名《司馬穰苴兵法》）較特別。《司馬法》之卷上〈仁本第一〉提及：「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天子之義第二〉提及：「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逾，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sup>2</sup>明顯涉及政戰之根源問題，應與司馬穰苴兵具有「文能附眾，武能威敵」之儒者特質有關。<sup>3</sup>其他兵書則普遍偏向戰略、戰術之應用，而罕言文德之禮與甲兵斧鉞二者夾輔之功效。

固然《六韜》與《司馬法》編訂完成之時間未有定論，但司馬遷已認為《司馬法》是戰國初期（田）齊威王「使命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sup>4</sup>至於《六韜》雖非姜太公親撰，然而內容比《司馬法》更豐富，時間也較早，故本文取為討論之重要材料。至於「孔子三朝記」雖非孔子親撰，而為孔子晚年身邊之重要弟子所傳述，其中〈用兵〉專篇

<sup>1</sup> 〔漢〕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收於〔漢〕司馬遷撰，〔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77年），頁550，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

<sup>2</sup> 此兩則資料均見於舊題〔春秋〕司馬穰苴：《司馬穰苴兵法》（長沙：岳麓書社，1993年），頁1149-1150。

<sup>3</sup> 〔漢〕司馬遷：《史記·司馬穰苴列傳》，頁861，晏嬰對司馬穰苴之評語。

<sup>4</sup> 同上註，頁862。

討論與治國高度相關的用兵問題，深刻影響學宗孔氏而身處戰爭頻仍之荀子（西元前 333?-238）。<sup>5</sup>荀子深切體會富國強兵、以王霸之道取天下之迫切，故〈議兵〉對此問題討論最多而且深刻。是故本文乃以〈議兵〉為核心，透過「孔子三朝記」、《六韜》之相關內容，析論荀子如何整合齊魯學之所長，以建構其兵學理論。本文所謂齊魯之學，概括言之，齊學乃指以姜太公領銜之重要政治家思想的相關著述為主，如《六韜》、《管子》、《晏子》；魯學則以孔子所上承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脈相承之禮樂文化傳統為核心。雖學界習稱齊魯之學，然荀子之學乃以魯為主而齊為輔，故以下採取魯先齊後之序論述。

## 二、從「孔子三朝記」的整編論荀子之發展魯學

孔子對戰爭持審慎之態度，反對子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式的有勇無謀，主張「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sup>6</sup>孔子主張有國者平時就要有「足食，足兵，民信之」的基本準備，<sup>7</sup>且要教導人民作戰之道，庶幾「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反對「不教民戰」，<sup>8</sup>而非一概反戰。孔子也反對兵不以義動，故而對於季氏將伐顓臾，表示「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sup>9</sup>再證諸其所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sup>10</sup>可清楚得知孔子並不反對征伐，但應以「義」為衡量。尤其周王室早已名存實亡，故無法期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只能退而求其次，期待「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尚且可保有「十世希不失」之局

<sup>5</sup> 荀子生卒年之說法多端，此說根據楊家駱主編：《歷代人物年里通譜》（臺北：世界書局，1993年），頁5，以生年為西元前316。然又註記另一說可據〔清〕汪中〈荀卿子年表〉、〔清〕王先謙〈荀子考證〉、劉汝霖〈周秦諸子考〉等資料，而定生年為西元前333。今人廖名春、梁濤以及林桂榛等之說法，約生於西元前336，較接近西元前333；〔日〕佐藤蔭將之則以為約西元前316，較接近西元前313。

<sup>6</sup>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述而》，收於〔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年），頁61。

<sup>7</sup>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顏淵》，頁107。

<sup>8</sup> 分別見於〔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子路》，頁119、120，「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sup>9</sup>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季氏》，頁146。

<sup>10</sup> 同上註，頁147。

面。故孔子周遊列國長達 14 年，乃旨在找尋「有道明君」，俾能維護政權至少在諸侯之次穩定狀態。此從孔子對齊國陳成子弑簡公的弑君之事件，尚且慎重其事地沐浴以告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sup>11</sup>可見其強烈申討「亂臣賊子」以維護君臣大義的基本態度，已成為學宗孔氏之荀子的軍事布局重要指導原則。

基於政在國君之理想，當其自衛返魯而擔任國老，面對已無實權之哀公詢問治理千乘之國，仍鄭重其事地告以理想治國之道：於〈千乘〉先建立「不仁，國不化」之根本心態，要求「五官治執事政」皆能得其道。<sup>12</sup>其次，於〈四代〉彰明四代之政刑皆可法，提出陽德陰刑相輔為用之重要。其三，於〈虞戴德〉提出率天祖地、興民之德的重要。其四，於〈誥志〉提出以禮會時之重要，效法聖人「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之作為，則君國大治。<sup>13</sup>其五，於〈小辨〉提出「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之為政綱領，務使「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行政；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天子；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士學順，辨言以遂志；庶人聽長辨禁，農以力行」各盡其職。<sup>14</sup>其六，於〈用兵〉提出「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最重要之軍事哲學指標。<sup>15</sup>其七，於〈少閒〉則依循「以儀辨等，則民不越」之重要原則，<sup>16</sup>勉勵哀公效法古代聖王用人之道，名器不可假人，<sup>17</sup>掌握人君之實權。<sup>18</sup>

從《漢書》〈藝文志〉收錄「孔子三朝記」七篇，且將其列入《論語》類，<sup>19</sup>可見班固認為其內容與孔子有關。至於《三國志》之〈蜀志·秦宓傳〉，

<sup>11</sup>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憲問》，頁 127-128。

<sup>12</sup> 其詳參見[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千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 153-163。

<sup>13</sup> 其詳參見[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誥志》，頁 179-186。

<sup>14</sup> 其詳參見[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小辨》，頁 205-208。

<sup>15</sup> 其詳參見[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用兵》，頁 209-212。

<sup>16</sup>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地官·大司徒》，收於[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十三經注疏》，頁 151。

<sup>17</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昭公三十二年》，收於[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十三經注疏》，頁 934，「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sup>18</sup> 其詳參見[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少閒》，頁 212-223。

<sup>19</sup>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 1717。

則有「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之載，而裴注即云：「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sup>20</sup>可見直至晉初，劉向《七略》所本之「三朝記」仍在，可惜隋唐之後不見著錄。清代學者倡歸原典以明經義，故而對《大戴禮記》多有注意者；其中尤以王聘珍之解詁最為重要。王氏以為「孔子三朝記」乃孔門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原在《古文記》之中。<sup>21</sup>共計七篇之「三朝記」，阮廷卓以其雖非孔子所自記，然而其源則應有本有紹，且成書年代甚早，屬於先秦古籍斷無可疑。<sup>22</sup>綜觀此七篇旨在論述治國之綱紀與要道，非僅合於國老應盡的職責，且與孔子主張博施濟眾、以安百姓之為政理想相貫串。<sup>23</sup>

由於孔子在〈小辨〉中亟言「禮樂而力，忠信其君」，<sup>24</sup>且強調力行之重要，與〈仲尼燕居〉孔子回答子張問政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之說法相近。<sup>25</sup>此現

<sup>20</sup>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蜀志·秦宓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974。

<sup>21</sup> [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目錄》，頁6-7。

<sup>22</sup> 其詳參見[日]武內義雄：〈兩戴記考〉，收於江依菴編譯：《先秦經籍考》（臺北：新欣出版社，1970年），頁153-185，以為〈小辨〉連用「忠信」二字而不用「誠」字，而知其未在荀子之後。阮廷卓：《孔子三朝記解詁纂疏》，《國文研究所集刊》第7期（1963年6月），頁537-538，則進而徵引《荀子》、《左傳》多處之記載與〈小辨〉、〈虞戴德〉、〈四代〉之文相同或相近者，且認為此乃《左傳》襲孔子之語，因而認為「孔子三朝記」不特不在《荀子》之後，而且還應在《左傳》之前。筆者認為武內根據「孔子三朝記」文中未用「誠」字之現象，而斷其時代下限之說法，應可採信；然而阮氏以《左傳》與「孔子三朝記」相同或相近者，即《左傳》襲孔子之語，則因二書所採資料之來源以及成書之確實年代不明，而宜稍作保留，不過造成此一現象，至少可說明二者之年代相去不遠。

<sup>23</sup>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雍也》，頁55，載：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憲問》，頁131，載：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sup>24</sup> [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小辨》，頁207。

<sup>25</sup> 見於[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仲尼燕居》，收於[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十三經注疏》，頁856。有關〈仲尼燕居〉內容所屬之問題，其詳參見林素英：〈〈仲尼燕居〉、〈孔子閒居〉與〈論禮〉纂輯之比較：以〈民之父母〉為討論中介〉，收於丁四新主編：《楚地簡帛思想研究（三）》（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284-315。林素英：〈《禮記》〈經解〉連續四篇之儒學思想發展：結合戰國簡文與《荀子》

象不但與子張喜問入官與學干祿之習性相關，更與其躬行實踐孔子「言忠信，行篤敬」之教誨，且主張士應該「見危致命，見得思義」之性格類似。<sup>26</sup>由於用兵是為政之重要問題，因此特別於〈用兵〉記錄蚩尤乃「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sup>27</sup>不配稱為「作兵」者，而「作兵」者，必須是能用兵止亂、禁殘止暴於天下之聖人，方可稱為王者之兵。參照《韓非子》將子張之儒列於孔子之後儒分為八之首位，<sup>28</sup>且郭店與上博兩批竹簡涉及《論語》之相關論述多集中在子張身上，都可說明子張一派曾經流傳於楚國之事實。<sup>29</sup>子張乃孔子晚年身邊的極重要弟子之一，志在為政非常明顯。由於「孔子三朝記」之文字相當古樸，記錄之時間應不甚晚，因此參照〈仲尼燕居〉所載，子張極可能為「孔子三朝記」之記錄者；即使退一步說，「孔子三朝記」由子張之後學整理成篇，但也應該成於荀子以前。荀子為楚蘭陵令 18 年，對於子張之儒流傳楚地之「孔子三朝記」自然知之甚深。雖然荀子於〈非十二子〉點名批判子張氏、子夏氏、子游氏之賤儒，然而正如郝懿行所言：「此三儒者，徒似子游、子夏、子張之貌，而不似其真，正前篇所謂陋儒、腐儒者，故統謂之賤儒。言在三子之門為可

---

之討論》，收於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等主辦：《「紀念沈文偉先生百年誕辰暨東亞禮樂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杭州：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2016 年）。該兩篇論文中，曾對照《論語》原典，並參考近人以躬行「忠信」為子張特質之說法，推論〈仲尼燕居〉傳自子張氏之儒。陳連慶：〈先秦儒家的演變及其有關問題〉，《史學集刊》1987 年第 3 期，頁 1-13，則依循陳澧、章太炎「儒墨相通」之理路（但否認章氏主張〈千乘〉為孔子之言），認為子張是儒家中最具有墨家色彩者，主張「孔子三朝記」七篇全是子張之儒的文獻。陳氏與筆者之結論雖似相近，其實差異極大。鄙意主張《禮記》〈經解〉連續四篇仍應視為孔子之言，而傳自不同之弟子，〈仲尼燕居〉傳自子張氏之儒，其餘三篇則傳自子夏氏之儒。

<sup>26</sup> 《大戴禮記》收有〈子張問入官〉專篇。〔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為政》，頁 18，載子張學干祿；〔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衛靈公》，頁 137，載子張將「忠信」之說書諸紳；〔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子張》，頁 171，載子張對士之主張。

<sup>27</sup> 〔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用兵》，頁 209。

<sup>28</sup> 見於〔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顯學》（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456-457，「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sup>29</sup> 周鳳五：〈讀上博楚竹書〈從政〉甲篇劄記〉，收於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頁 187-189。

賤，非賤三子也。」<sup>30</sup>蓋因荀子深入「孔子三朝記」之經藏，更能深感內忠信、外篤敬之子張，主張勇武以維護正義之用心，可是其末學竟僅知虛飾外表，已嚴重背離師意，故提出嚴厲之批評。

從現行《荀子》之篇名稍加判斷，如：〈仲尼〉、〈儒效〉、〈王制〉、〈富國〉、〈王霸〉、〈君道〉、〈臣道〉、〈致仕〉、〈議兵〉、〈疆國〉，乃至於荀子後學整理之〈哀公〉、〈堯問〉，都與「孔子三朝記」中孔子答哀公問之內容有關。由於〈議兵〉與戰國時期最白熱化之議題有關，故而本文僅取〈議兵〉為討論核心，觀察其兵學思想中的魯學基礎。

### 三、從《六韜》的成書情形推論荀子對齊學之接受

《六韜》全書 60 篇，以姜太公回答周文王、武王之問的形式寫成。在先秦古籍中最早提到《六韜》之書名者，為《莊子·徐无鬼》記載女商所言：「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sup>31</sup>能與《詩》、《書》、《禮》、《樂》，從橫、從兩相對立之層面立說，則前後兩部分之對象與地位應約略相當，故而懷疑〈金板〉、〈六弢〉乃書名而非篇名，且還可能是《金板（版）六弢》更接近事實。

〈藝文志〉雖無以《六韜》為名之著錄，然於儒家類則有「《周史六弢》六篇」。道家類中則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並於其下再區分為《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而《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則歸入禮類。<sup>32</sup>可見《六弢》至遲在戰國晚期已相當流行。或許緣於當時征戰頻繁，兵書因特別實用而流傳廣，但不乏重複之情形，有為之君主自然會命人整理兵書以便應用。西漢整理兵書，<sup>33</sup>使先秦古兵書得以留傳下

<sup>30</sup> 見於〔清〕王先謙：《荀子集解·非十二子》（臺北：藝文印書館，1988年），頁244，「弟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嚙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王先謙還特別引郝懿行之說法為證。

<sup>31</sup> 〔周〕莊周：《莊子·徐无鬼》，收於〔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貫雅文化，1991年），頁821-822。「集釋」中，引〔晉〕司馬崔云「〈金板〉、〈六弢〉皆《周書》篇名」，恐應作「《金板六弢》」或「金板《六弢》」更為恰當，代表鑄在金板之《六弢》，與《周書》有關。此一現象，可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所出現之「丹書」類似。

<sup>32</sup> 分別見於〔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頁1725、1729、1709。

<sup>33</sup> 西漢三次整理兵書：首先，漢高祖命張良、韓信整理先秦兵書，序次兵法182家。其次，

來，然因整編者觀點不同，導致〈藝文志〉出現《周史六弝》或《太公》同實異名，或歸入禮、儒、道類各有不同之現象。《隋書》已直接將《太公六韜》歸入兵家，並注有：「周文王師姜望撰。」<sup>34</sup>然而宋以後，受疑經改經之影響，學界多認定《六韜》乃戰國時期之人，甚或更晚者託名呂尚之作品。

周鳳五系統結合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的《六韜》殘簡、敦煌所出唐寫本《六韜》殘卷，辨明《六韜》在先秦兵法中成書較早。舉凡其書內容與《吳子》、《尉繚子》近似之處，乃《吳子》、《尉繚子》抄襲轉化《六韜》，而非《六韜》抄襲《吳子》、《尉繚子》。至於《六韜》與《孫子兵法》之相同處，則有可能同據一文以立說。另外，由於騎兵戰術在戰國以後才逐漸發展成功，而《六韜》與《孫臏兵法》對於騎戰之「十勝」或「十利」都相當深入而具體，故可反映兩書寫作之時代相去不遠，下限應在戰國晚期。<sup>35</sup>此《六韜》之成書下限在戰國晚期之說法，獲得學界大致認同。近年來，由於出土資料不斷公布，銀雀山有關《六韜》殘簡之資料也較明朗，遂引發學者對相關問題再行深入研究，因而對於《六韜》成書之情形也有一些突破。

例如陳青榮研究指出：《六弝》之以「六」為名，象徵天子有六軍；「弝」則為弓衣、劍袋之武器袋，用以象徵兵戎之事；其所以以文、武、龍、虎、豹、犬為「六弝」之子目，乃藉由獸名以顯示軍威，且以弓袋上不同獸皮之花紋以別行伍。由於春秋以前主要以弓箭為殺敵之利器，因而以「弝」為名即可凸顯該時代印記。最早改《六弝》為《六韜》者，乃《淮南子·精神訓》，主要緣於漢代盛行佩劍，故轉以「劍」象徵戎事，而以「韜」取代「弝」。由此也可見《周史六弝》或《金版六弝》都可反映《六弝》成於春秋時代之訊息，而與顏師古於《漢書·藝文志》所注「惠、襄之間」的時間相合，乃齊桓公之時，由官府根據祖廟所藏之周初舊檔，結合瞽人所

---

武帝命軍政官楊仆整理兵書，編成《兵錄》。最後，成帝命步兵校尉任宏研究兵書，編撰《兵書略》，將兵書分成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類，收入劉歆之《七略》，再納入《漢書·藝文志》。

<sup>34</sup> [唐]魏徵等撰：《隋書·經籍志·兵家》（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34，頁1013-1017-1018。

<sup>35</sup> 其詳參見周鳳五：《六韜研究·六韜著成時代的推測》（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78年），頁339-392。

傳的「太公舊法」而成《金版六弢》。《金版六弢》還具體影響管仲有關「立三官」與「四民分業」、「五家之兵」與「軍政合一」政策之規劃與執行。<sup>36</sup>陳青榮將《金版六弢》之成書時代提前至春秋時期之說法，獲得全晰綱以及楊朝明之贊同。全晰綱並補充說明，齊威王因企圖再次稱霸諸侯，故而使大夫整理《司馬兵法》之外，並再次對《六弢》進行修訂，遂雜揉進一些戰國時代之標記。<sup>37</sup>全晰綱主張今本《六韜》經歷前後兩次較大的整編，是比較合乎全書內容之推論，可惜全氏並未詳加說明原委。

綜合上述說法，《六弢》初立之因緣，主要因為武王伐紂乃典型的以寡勝眾之戰爭實例，所以該戰役之戰前擊劃、戰時之運用謀略，事後之安邦定國，必然會有史官等相關人員加以記錄，使成為締造周朝最重要之大事紀，故稱《周史六弢》，若以金版之材料著錄內容，則成為《金版（板）六弢》。從《左傳》展喜所言：「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sup>38</sup>周公之制禮作樂與姜太公之軍事謀略是輔弼周王室之雙翼，因此《周官（後稱《周禮》）》中之夏官司馬之執掌內容與事務規劃，姜太公極可能就是掌舵者。<sup>39</sup>然因姜太公為齊國始封君，故而齊之太祖廟中也會保有「太公舊法」之資料。由於兵法及戰爭謀略乃《六弢》之重要內容，極重實用性，故而必須因應時空環境之改變而增添或修改內容，因而重新整編《六韜》有其現實意義。

第一次整編《六弢》，即太公之第十二代孫齊桓公（西元前 685-643 在位）。蓋因距離武王伐紂已 400 年，很多實戰布局已不能不調整，因此由管

<sup>36</sup> 其詳參見陳青榮：〈重新認識《六韜》的資料價值〉，《管子學刊》1993 年第 4 期，頁 65、66-67；陳青榮：〈《六韜》書名含義及時代信息〉，收於徐樹梓主編：《姜太公與齊國軍事文化》（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頁 250-258。

<sup>37</sup> 其詳參見全晰綱：《青銅的戰神——齊魯兵家文化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年），頁 57-70。楊朝明：〈關於《六韜》成書的文獻學考察〉，《中國文化研究》2002 年第 1 期，頁 58-65；又收於楊朝明：《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臺北：臺灣書房，2007 年），頁 345-358。

<sup>38</sup>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僖公二十六年》，頁 544。

<sup>39</sup> 姜太公自文王時期起，即長期輔佐文王文治武功的治國之道，武王伐紂成功，更得力於太公之戰略應用與沙場指揮作戰，因而最具有設計軍事制度之資格與能力。在商紂自殺、周初政權初定之後，周公所主導之「制禮作樂」整體王朝制度規劃時，有關軍政、兵刑之編排與聯繫，都理應以具有實戰輝煌戰績之姜太公為主腦人物。

仲主導修法改革，協助齊桓公圖謀稱霸。陳青榮先確認齊國官府所藏舊法乃太公舊典，再以齊桓公之「尊王攘夷」，乃源自先祖太公所承受成王恩賜的「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的大權，故有必要宣揚此特殊權柄，以神聖化其伐山戎以救燕、伐楚以責包茅不入貢王室之行動，進而取得軍事主動權之地位。<sup>40</sup>陳氏此說應屬合理之推論。

另一次整編，則與創立稷下學宮的田齊桓公（田午，西元前 374-357 在位）直接相關。蓋田和（齊康公之大夫）服膺姜太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之主張，<sup>41</sup>遂先造成「田氏代齊」之事實，再由田齊桓公效法姜齊桓公企圖另開霸業。有鑑於管仲建議姜齊桓公欲稱霸諸侯，必須「謀而後動」，故先「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其次，「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以安國，再「作內政而寄軍令」，<sup>42</sup>終於將齊桓公推上霸王之地位，是故田齊桓公也有意仿效之。田午效法小白「設庭燎以招賢士」，<sup>43</sup>與創立「噴室之議」以自警戒之舉，<sup>44</sup>另創「稷下學宮」以優禮天下賢才。可惜田午在位僅 18 年，未及小白在位 43 年之半，儘管「稷下學宮」已經開始，齊國經濟也相當富足，然而霸業仍有待繼位之威王（田因齊，西元前 356-320 在位）繼續努力。齊威王在位 37 年，自詡為黃帝之後裔，故遠紹黃帝之大業，近承小白聖主明君一匡天下之傳統，積數十年之努力而自稱為王，任賢用士以發展其理想。或許基於此歷史因緣，全晰綱推論《太公六韜》之整編正在此時。相對於此，于孔寶以為「《六韜》成書於戰國文化中心之稷下學宮」，<sup>45</sup>雖較籠統，卻不失為較穩當之說法。若將整編《六韜》之時期，從威王推遲到齊宣王時（西元前 319-301 在位）稷下學宮之極盛期，<sup>46</sup>則已接近戰國晚期，因而對於《六韜》中所出現游仕、徵兵現象與大量用弩之狀況，都能做更好且更合理之說明。

<sup>40</sup> 其詳參見陳青榮：〈姜太公與管仲改革〉，《管子學刊》1995 年第 1 期，頁 64-69。

<sup>41</sup> 舊題〔周〕呂望撰：《六韜·文韜·文師》（長沙：岳麓書社，1993 年），頁 1086。

<sup>42</sup> 〔春秋〕左丘明：《國語·齊語》（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頁 230-231。

<sup>43</sup>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秋官·司烜氏》，頁 550，「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漢〕劉向：《說苑·尊賢》，收於王雲五主編：《四部叢刊正編》第 1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頁 77。

<sup>44</sup> 見於〔周〕管仲著，黎翔鳳校注：《管子校注·桓公問》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047-1048，管仲建議桓公以東郭子為「正士」。

<sup>45</sup> 其詳參見于孔寶：《稷下學宮與齊文化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0 年），頁 141-146。

<sup>46</sup> 稷下學宮大約一百五十年之興衰發展過程：自田齊桓公（西元前 374-357 在位）創立，

為求齊國能在戰國時期的舞臺綻放異彩，則重新整編齊國兵學著作，自是一項發揚祖業且足以誇耀世人之工作，於是諸如：《六韜》、《司馬穰苴兵法》、《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書之編訂，都極可能在眾多稷下學士之努力下陸續完成。若對照相關歷史，則後三部因為時代較後，要編訂並不成問題，《孫臏兵法》更屬當世之作（龐涓死於齊魏馬陵之戰正是西元前341之時），因此司馬遷之說不成問題。然而對於攸關齊國兵學始祖姜太公兵法之《六韜》，由於時代湮遠，且涉及之層面較廣，所以不能不更謹慎從事以求垂訓後代，不適合與後三部兵書一體看待。經歷威、宣時期之編訂，《六韜》之內容大抵確定，<sup>47</sup>成為目前所見雜有戰國戰爭狀況之紀錄。

荀子始游齊之確切時間，雖然威、宣、潛、襄、平王各代之時都各有學者主張。然對照荀子在稷下學宮擁有「最為老師」之稱譽，且「三為祭酒」之時間，仍以《史記》所載：「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sup>48</sup>最有可能。既然荀子在襄王時期名聞稷下，當時距離威、宣時期整編《六韜》大約已有三十到四十年左右，再加上戰國晚期戰爭頻繁而慘烈，則有關用兵之問題更是稷下學士討論之熱點，倘若荀子無法精通各部兵書，實難登稷下學宮之榮譽寶座。由於荀子具有深厚的魯學根柢，因此在眾多兵書中，《六韜》因為內容包含標本兼治的治國安民整體觀，並非單純記錄兵法戰略技術，故容易被具備魯學根柢的荀子吸收整合，而反映在荀子的兵學理論中。

#### 四、荀子兵學理論與「孔子三朝記」、《六韜》的齊魯學關係

三家分晉後，歷史進入戰國時代，受到侵略兼併如影隨形之影響，都特別講求實際與效率。荀子出生時之趙國時常受到匈奴侵犯，幸好趙武靈王推動「胡服騎射」（西元前325-299），而使趙國一躍成為強國。荀子親身

---

經濟威王（西元前356-320在位）大力發展，極盛於宣王（西元前319-301在位）時，潛王（西元前300-284在位）開始中衰，襄王（西元前283-265在位）時再行中興，於平王（西元前264-221在位）時期消亡。

<sup>47</sup> 〈文韜〉：論述治國安民之政治策略，透過愛民、上賢、擇人與注重行政之措施，使國家立於戰而不敗之境地。〈武韜〉：論述對敵戰爭之韜略，主張不輕起爭端、謹慎應戰，且應謀而後動。〈龍韜〉：論軍隊建置、將帥選拔及軍事指揮之韜略。〈虎韜〉：敘述各種武器裝備之運用與進攻戰術之指導。〈豹韜〉：敘述各種特殊地形之作戰原則。〈犬韜〉：論述各不同兵種之協同作戰原理。

<sup>48</sup> 〔漢〕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頁946。

經歷趙國由弱轉強，又眼見趙惠文王 4 年（西元前 295）趙滅中山國，齊湣王 38 年（西元前 286）齊、魏、楚滅宋而三分其地之事實，深知強弱兼併瞬息萬變之道理，因而特別重視富國強兵之現實問題。由於〈議兵〉缺乏對長平戰役前後被白起坑殺四十五萬（西元前 260），導致趙國從此轉衰的任何討論，可知議兵之事應在趙孝成王（西元前 265-245 在位）即位不久，趙與秦因上黨問題對決前的西元前 265-262 最有可能，<sup>49</sup>否則文中不可能僅提齊、楚、秦、燕、魏等國用兵狀況，而不為母國畫謀圖策。可惜趙孝成王與臨武君雖稱善荀子之兵學理論，實則並未深入理解為君、為帥之道，且未將荀子的致勝之道運用於對秦之大戰，以致誤入敵人圈套。由於秦自商鞅變法後，逐漸壯大為西陲大國，與齊東西並峙稱強，因此西元前 320-265 間各國與秦發生之慘烈爭戰，<sup>50</sup>都成為荀子議兵之重要背景資料。

#### （一）政治為先的兵學理論乃以魯學為主

曹元弼、沈文倬師生，認為二戴所輯《禮記》多採自孔門七十二子或後學之「古禮記」，其中政類、學類及〈樂記〉等三十多篇較早，約在魯穆公（西元前 415-377 在位）時，即使禮類 39 篇較晚，也在魯康公（西元前 352-344 在位）、景公（西元前 343-323 在位）之際，都在荀子之前，因而《荀子》中出現與二戴《禮記》重同或近似者，都應視為荀子援引前人之文以增強自我理論之分量。<sup>51</sup>《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以荀況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在諸子之中最為近正，<sup>52</sup>可謂學界持平之論。因此〈議

<sup>49</sup> 其詳參見〔日〕佐藤將之：《荀學與荀子思想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2015 年），頁 79-82。

<sup>50</sup> 其詳參見吳文璋：〈荀子〈議兵〉篇析論〉，《成大中文學報》第 8 期（2000 年 6 月），頁 161-177。齊湣王 6 年（西元前 318）：趙、韓、魏、楚、燕五國聯合伐秦，不勝。齊湣王 7 年（西元前 317）：秦與韓、趙戰，斬首八萬。齊湣王 12 年（西元前 312）：秦擊楚，斬首八萬。齊湣王 17 年（西元前 307）：秦拔韓宜陽，斬首六萬。齊湣王 24 年（西元前 300）：秦擊楚，斬首三萬。齊湣王 31 年（西元前 293）：韓、魏伐秦，白起敗之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齊襄王 4 年（西元前 280）：秦擊趙，斬首三萬。齊襄王 10 年（西元前 274）：秦拔魏四城，斬首四萬。齊襄王 11 年（西元前 273）：白起擊魏華陽軍，斬首十五萬。

<sup>51</sup> 其詳參見沈文倬：〈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收於沈文倬：《宗周禮樂文明考論》（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54。該篇原載於中華書局 1982 年《文史》第 15、16 輯。

<sup>52</sup> 〔清〕紀昀、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年），頁 3-4。

兵〉中注重禮義，以仁義之兵展現王者之志的說法，乃發展「孔子三朝記」諸侯治國之道而來，其根柢在魯學本毋庸多說，以下主要藉由歸屬齊學系統的《六韜》多言道德禮義，更凸顯魯學強調道德禮義為治國之本的要義。茲分析如下：

### 1. 隆禮貴義使民心歸附

荀子深明〈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之宗旨，<sup>53</sup>故而當臨武君以「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回答趙孝成王何謂「兵要」之問，<sup>54</sup>遂以「術不可以為要」猶「末不可以為本」反駁之：

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議兵〉，頁 470）

荀子認為湯武能得天下之主因，在於能齊一人民，而得民心親附。倘若湯武未能得民心，則未必能勝，故而能「壹民」者，始得用兵之本而締造必勝之果。此即〈議兵〉所載「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議兵〉，頁 472），因而抵禦外侮時，則可產生「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議兵〉，頁 472）式的自發性反應。

荀子更藉由回答李斯，再次強調禮為用兵行道之本：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議兵〉，頁 491-492）

荀子雖然於各篇中亟言禮義，其中又以「禮」為本根，必待內存禮敬始可形諸於外，以成就威儀之「義」，成為王公貴族得天下之途徑。至於堅甲利兵、高城深池、嚴令繁刑，並非無用，然僅可放在鞏固「本」之後的「末」之地位。倘若無「本」，則其「末」亦為虛飾無用之物，一旦有外力入侵，所有虛飾物瞬間都將轉易他主而不為己用。

<sup>53</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大學》，頁 983。

<sup>54</sup>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議兵》，頁 470。

荀子上述說法，算是善用〈文韜·文師〉更務實的「以民為本」之思想，以補強魯學偏重虛理之不足，其文云：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文韜·文師〉，頁 1086-1087）

太公此一思想旨在明告文王「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勉勵文王從積極善取天時、地財而與人共享之，且要具備排紛解難、及時拯救世人於急患之能力，以成就仁德之事實。君主要與民同悲喜憂樂，引導臣民有正確之是非好惡觀念，理解大義所在之處才是大利之所在。此所謂大利者，並非只是單純之取得、占有財物而已，而是能如《易》的乾坤之道，善體天地萬物之性，而具有大生、廣生之力量與作用，成就日新之盛德與富有之大業。<sup>55</sup>換言之，能善得天地大生廣生之盛德以與萬民共享者，即是天地為民立君之大義所在，故能得天下。倘若君主不能善盡此職責，則有道之賢者自然可以取而代之。因此〈議兵〉即言：「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所謂仁義之兵也。」（〈議兵〉，頁 491）說明仁義之兵，乃具有德義之君主，長期積累仁義之實而深獲民心。最明顯之事例，即是姜太公輔佐文王，使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之事實，且其中還包含伐密、伐崇之實戰紀錄，具體說明德義與威刑之相輔為用。

君臣應有之禮也是太公極注重，〈文韜·大禮〉云：

為上唯臨，為下唯沈；臨而無遠，沈而無隱。為上唯周，為下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文韜·大禮〉，頁 1088）

<sup>55</sup> 見於〔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繫辭上》，收於〔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十三經注疏》，頁 149-150，「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變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在君臣相待之禮以外，太公對君主還有更高之要求，與儒家重責人君之意相同，認為位居「主位」者首應：

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  
（〈文韜·大禮〉，頁 1088）

其次，又應注重「聽」之要領與「明」之重要：

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韜·大禮〉，頁 1088）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蔽矣。（〈文韜·大禮〉，頁 1088）

君主若能善體其位，善盡其聽，又能善用其明，則可秉持「大禮」而成有道明君。荀子還進而主張：君主要有「虛一能靜」之心，從定靜而深思熟慮，使知無所不盡以成其智；耳道常保暢通以求善聽而無障蔽，則姦慝之讒言無以入乎耳以妨害其聰；以天下之目視，則事事彰明而不受小人蒙蔽、蠱惑。此說近於《論語》孔子的「君子有九思」，<sup>56</sup>也活用〈小辨〉「忠有九知」之說：

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sup>57</sup>

主政君子若能擁有清明靜定之心，則覺知靈明、不受蠱惑。荀子上承此觀念而於〈議兵〉中認為：「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議兵〉，頁 472-473）君主而能「聰明警戒和傳而一」，則能正確決斷、指揮得當，可惜趙孝成王無法得其真髓，誤中秦之反間計，竟以趙括代廉頗。

此外，〈文韜·守土〉更闡述仁義之道，云：

<sup>56</sup>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季氏》，頁 149。

<sup>57</sup> [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小辨》，頁 208。

敬其眾，合其親。敬其眾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  
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  
之以力。敬之無疑，天下和服。（〈文韜·守土〉，頁 1089）

君主實踐仁義之道，仍然必須同時兼有合親而體現仁、敬眾以成其義之德性，始可和諧群眾、與民同樂，常保清明之心，以順應天下之常道，落實仁義之虛理以為民生利，具體改善生存之環境。

## 2. 修德愛民以禁暴除害

從荀子回答陳鬻，可知其以仁義議兵之要旨：

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議兵〉，頁 489-490）

戰國晚期之荀子非常清楚戰爭必須勇敢、理智的對待，以降低戰爭對生民與社會資源之破壞，故而有必要宣揚用兵之目的在於「禁暴除害，而非爭奪利益」。一旦確定此宗旨，則違反此者即是製造社會動亂，而有待仁者率領仁義之兵共同誅除此暴力，化戾氣為祥和，回復人間應有之秩序。例如：〈少閒〉即歷數堯、舜、禹、湯以及文王等五王之德，皆能承受天命而使四夷來服。<sup>58</sup>孟子更直指堯、舜兩帝以及禹、湯、文、武四王，其「一怒」而發動戰事，皆旨在實踐「安天下」之雄心壯志，<sup>59</sup>故能近悅遠來，德行流布於大江四海。

相對於荀子偏向理論性之戰爭原理論述，〈文韜·國務〉更提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韜·國務〉，頁 1087）即是「愛民」，倘若再詳言之，則為：

<sup>58</sup> 其詳參見〔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少閒》，頁 216-221。

<sup>59</sup> 見於〔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梁惠王下》，收於〔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十三經注疏》，頁 32，孟子以文王「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為「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以「一人衡行於天下」為恥，故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使天下不敢有越厥志者。

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省刑罰，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己物。此愛民之道也。（〈文韜·國務〉，頁 1088）

這些較具體之「愛民」措施，涉及藉由「足食」以得「民信之」的基本前提，雖不見於〈議兵〉，但〈富國〉有更深入之討論。由於仁者旨在愛民，故對於破壞人民生活者，不惜動用仁者之兵以禁暴除害，因此〈用兵〉明以「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弭之」駁斥用兵之不祥。<sup>60</sup>具體為之，則〈文韜·六守〉已指出人君應該慎守仁、義、忠、信、勇、謀六大原則，且使農、工、商之「三寶」各安其處，而達到「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完，則國安」（〈文韜·六守〉，頁 1089）之境地。由於「六守」之根本在於仁、義，《荀子·大略》亦掌握此根本而闡述之：

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sup>61</sup>

荀子將仁內義外透過禮而平衡之，致使仁、義、禮三者貫通而達到「道」之意義，凸顯治國以禮，乃萬古不易之政治原則。因而凡是能合乎禮之真精神者，必也是合乎仁義之作為。

從武王以太公、周公夾輔周王室的布局，早已說明尊禮重義必須與尊賢尚功彼此相濟，而荀子以仁義之兵實現王者之志，即是揉合周孔之魯學與太公之齊學，以建立其富國強兵之道，且以仁義之兵做為維護和諧社會之後盾。

<sup>60</sup> [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用兵》，頁 209-210。

<sup>61</sup>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大略》，頁 778-779。

## (二) 對《六韜》的趨避透顯「魯學為體，齊學為用」之事實

荀子雖在蘭陵長期從政，也熟讀兵書，但畢竟缺乏掛帥帶兵之野戰經驗，故甚少涉及實戰技術與謀略運用之內容，且還隱約貶抑軍事權術之運用。以下分由三點論述：

### 1. 大王選擇將帥之要領

荀子於〈議兵〉指出影響王者之兵的關鍵在大王，將率（帥）則為「末事」。荀子並非不知沙場上之最高統帥是將帥，故其旨在於強調大王應慎選將帥，舉賢而任之，因其賢不肖直接關係戰事成敗，不可不慎。此雖上承〈少閒〉「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之四代五王取人以治天下之原則，<sup>62</sup>但仍以〈文韜·舉賢〉「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文韜·舉賢〉，頁 1091）之說更具體，也凸顯時勢日趨複雜後，將領之選拔已應考慮更具體之條件：

#### (1) 懂得靈活運用「六術」

戰況瞬息萬變，將帥應先做最好之準備，堅定信心而不可游移，避免做錯誤之決定，若已作出決定則不再懊悔，凡事盡其在我，故〈議兵〉呼籲善用「六術」：

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  
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  
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議兵〉，頁 485）

此「六術」直接關係將帥對軍隊之掌控術。前二術在於嚴明軍紀，務使威行令止、信賞必罰；可與〈龍韜·將威〉之「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龍韜·將威〉，頁 1098），〈文韜·賞罰〉之「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文韜·賞罰〉，頁 1091）相互參看，而明顯見其屏棄「術用」之層面。中間二術旨在呼籲靈活調動軍隊之重要；最後二術則說明掌握敵我狀況以應敵之重要。後四術可與〈文韜·兵道〉之「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文韜·兵道〉，頁 1092）相互參看。

<sup>62</sup> [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少閒》，頁 215。

從「六術」之內容，明顯可見荀子注重將帥得用兵之「體」，太公則兼「體」、「用」、「術」而有之，顯示荀子缺乏沙場戎戰經驗者之侷限。

### (2) 具「五權」之裁量智慧

謹慎權衡利弊得失，對於一般人已經相當重要，對於將帥更是如此。荀子於〈議兵〉提出以下「五權」：

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議兵〉，頁 485-486）

荀子此說可與〈龍韜〉之〈論將〉、〈選將〉章參看。由於「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故而將帥必須具備「五材」（〈龍韜·論將〉，頁 1097）而無「十過」。其中，勇、智、仁、信、忠為「五材」。勇而輕死、急而心速、貪而好利、仁而不忍人、智而心怯、信而喜信人、廉潔而不愛人、智而心緩、剛毅而自用、懦而喜任人為「十過」。選將則應提防士有外貌不與中情相應的十五種類型：嚴而不肖，溫良而為盜，貌恭敬而心慢，外廉謹而內無至誠，精精而無情，湛湛而無誠，好謀而不決，果敢而不能，慳慳而不信，怵怵而反忠實，詭激而有功效，外勇而內怯，肅肅而反易人，嗃嗃而反靜慤，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針對此弊，可透過「問之以言」等八種驗證法（〈龍韜·選將〉，頁 1097），辨別其詳、變、誠、德、廉、貞、勇、態之差異。可見荀子所重之大原則，雖上承孔子重「權」而來，<sup>63</sup>然而太公關照具體而微的選將細節，更能直接掌控戰爭成敗。

### (3) 具「三至」之承擔勇氣

將帥既然受命於君主，理當聽命於君主，然而戰陣之事遠在前線，必須當機立斷者多，無法等待稟報後方之君主以聽令行事，荀子遂有「三至」說：

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議兵〉，頁 486）

<sup>63</sup>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子罕》，頁 81，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堯曰》，頁 178，亦載有：「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梁惠王上》，頁 23，「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孟子更重行權之重要。

將帥最重要之任務乃在完成既定之使命，而非機械式聽命行事。由於「時難得而易失」，故應權衡輕重緩急當機立斷，而非事事向君主請命用兵之細節，以免延誤軍機。倘若將帥能夠力行此條目，也可降低昏庸之主聽信讒言而誤發命令之危險。〈龍韜·立將〉記錄將既受命，君親授斧鉞以交付「將軍制之」的權柄，宣示「軍不可從中御」、「軍中之事，不聞軍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龍韜·立將〉，頁 1098) 的指揮權。稍後之《孫子兵法·九變》亦明言：「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于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sup>64</sup>將「君命有所不受」列入通變一系，且明謂之「知用兵」，則知荀子雖然批評孫、吳皆以功利考量用兵之道，然因統帥權對於作戰之重要，仍採納其說以為良將之條件。此說正好與趙國不久之後與秦大戰時，趙孝成王誤信白起散播之謠言而撤換老將廉頗，改派空談戰略兵法之趙括為將之事件相對照。

#### (4) 以「至臣」為最高期許

荀子雖然務實，不過「至臣」之說，則可展現其理想的將帥典型：

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議兵〉，頁 486)

戰爭非發洩君主或將帥個人情緒之工具，須理智審慎判斷。「三至」說借用〈龍韜·軍勢〉「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龍韜·軍勢〉，頁 1100) 之說，又更近於《孫子兵法》〈火攻〉「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之說法。<sup>65</sup>由此可見荀子能實踐取人之長的優點。

<sup>64</sup> 舊題〔春秋〕孫武：《孫子兵法·九變》，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2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51。

<sup>65</sup> 舊題〔春秋〕孫武：《孫子兵法·火攻》，頁 55。

(5) 恭行「五無壙」之態度

「驕兵必敗」已清楚道破態度不佳，將導致戰敗之後果，最不可輕忽，故荀子特別強調以敬克制壙漫之態度：

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議兵〉，頁 486-487）

此處「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sup>66</sup>應屬同義之異文。若從意義言，〈武王踐阼〉使用「義」之語義應優於「計」，且更可彰顯恭行「敬」之態度對於戰略決斷的重要，與魯學注重合禮重義、敬慎敏行之作風一貫。

2. 重視兵之強弱問題

既然要面對戰爭，則關係戰爭相當直接的兵之強弱問題，乃是無法迴避之現實問題，荀子之說即可歸納為兩方面進行討論：

(1) 強弱之基本條件

由於強調王者之兵，因而荀子對於兵之強弱問題，仍著眼於君王之賢德與是否能隆禮貴義之根本問題上：

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印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議兵〉，頁 476）

此說語義簡明，可與〈文韜·盈虛〉太公述說帝堯王天下之狀況相比擬：

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績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德，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偽。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

<sup>66</sup> [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武王踐阼》，頁 104。

下鰥寡孤獨，振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韜·盈虛〉，頁1087）

倘能如帝堯之賢德愛民，則萬民親附，而為王者之強兵。堯之聖王典型乃孔子崇拜之偶像，時常出現於「孔子三朝記」的〈四代〉、〈誥志〉、〈用兵〉、〈少閒〉。由此可見凡是聖主明君，都認定賢德重義為強國之本。

## （2）強弱之態勢與效用

注重德義之外，荀子再具體對比強弱態勢之差異與效用：

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強，民不齊者弱；賞重者強，賞輕者弱；刑威者強，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是強弱之常也。（〈議兵〉，頁476-477）

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議兵〉，頁484）

王者本來就不可多得，再加上各種複雜因素影響，荀子也不得不重視兵器差異之客觀問題，因而兵之強弱也有等級區分。固然王者「不戰而勝」之強兵最理想，但可遇不可求，遂退而求其次，以霸王節制之兵，雖尚未能掌握本統之意義，卻不失為和齊之兵的一種。從孔子盛讚：「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已可見其通達能權。再從評論「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sup>67</sup>更可見孔子極關心春秋霸主之霸業，不但知之甚詳，且還能分析入微。綜合王、霸之兵，都具有凡事謹慎權衡，不輕啟戰端之共同特色。這也說明《六韜》在偏重「體」的文、武、龍韜之外，尚須輔以專言「用」的虎、豹、犬韜，以求體用兼備，具有消弭戰爭之勇武技術。

<sup>67</sup> 分別見於〔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憲問》，頁126、127。另外，〔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梁惠王上》，頁21，孟子所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之說，乃孟子有意轉移齊宣王之問題而說，並非實情。

### 3. 以「盜兵」非議「權術化」之軍事

荀子雖然與趙孝成王與臨武君暢談用兵之道，不過，其重點仍然在國家政治之如禮（理）推行，並不意在真正從事沙場軍事演練。甚且因為荀子缺乏此部分之實作歷練，自然無法與太公相提並論。是故荀子之兵學理論，雖然現實感已勝於孔孟，不過仍偏重道德禮義之說，以「盜兵」之說貶抑當代軍事大國：

#### （1）亡國之兵

齊國自從姜太公採行「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之政策，<sup>68</sup>以致人民多歸齊，遂使齊成為經濟大國。然而若無禮義作堅強後盾，則僅知追逐功利之結果，只能成為「亡國之兵」：

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彘，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議兵〉，頁 477-478）

溯自周初分封，太公以「尊賢上功」治齊，伯禽以「親親上恩」治魯，於是周公即預卜：「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sup>69</sup>其後，齊雖日見壯大，以至於霸，不過二十四世而姜齊亡，田成子有齊國，<sup>70</sup>周公之預卜應驗。田齊也效法姜太公與齊桓公之霸業，至威王時，逕自稱王，稱霸東方，威、宣時期號稱強盛。湣王還與秦王並稱東西二帝，但旋即仍復稱為王。然自樂毅破齊之後，即使後來田單復國，齊之勢力已無法與秦抗衡，不久而為秦所滅。故知無論姜齊或田齊，都以僅知崇尚功利而亡國。荀子更直接批評「齊之田單，楚之莊躄，秦之衛鞅，燕之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議兵〉，頁 484），然皆屬變詐之道，其勝敗實有機運問題存焉，並未進入「和齊之兵」的等級。

#### （2）危國之兵

魏國自魏文侯獎勵儒學，且在子夏西河學派積極培養人才之努力下，魏國最早成為戰國之強國。武侯則徒恃武功而不好文事，故武力雖強，然獎勵武功之配套制度不合理，遂危及國家安危：

<sup>68</sup> [漢]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頁 551。

<sup>69</sup> [戰國]呂不韋著，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仲冬紀·長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年），頁 605。

<sup>70</sup> 其詳參見[漢]司馬遷：《史記·魯周公世家》，頁 569。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議兵〉，頁 478-480）

由此可見獎勵武功走入偏鋒，必然危及國家經濟發展，一旦稅收減少，國家財力即轉趨薄弱。甚且全國之財富若僅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則一般民心將渙散而難以收附。換言之，徒有少數功臣支撐而缺乏廣大群眾親附，勢必導致國力無法提升而瀕臨危亡之險。

### （3）銳士之兵

秦國本來偏處西隅，經濟環境差，人民強悍好私鬥，幾近亡國。然而自秦孝公用商鞅變法，秦日漸轉強。因此當荀子入秦，即盛讚秦之強：

秦人其生民邾阨，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執，隱之以阨，忸之以慶賞，首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鬥無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眾強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議兵〉，頁 480-481）

雖然荀子認為秦之地形險要，人民生活古樸，官吏恭儉敦敬，士大夫不比周、不朋黨，朝廷議事有序不積壓，堪稱「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之類，故而四世國富兵強，長勝於各諸侯國並非僥倖而致。然秦終因無儒之故，不重禮樂教化，<sup>71</sup>因而兵雖強，卻轉瞬崩頹。由此可見荀子仍然把隆禮貴義，視為國家長治久安之唯一根本之道。證諸秦之國富兵強，雖然秦之力能兼併天下，統一天下，然而「能兼不能凝」之結果，導致秦帝國旋起旋滅，無法長久。至於「凝之」之道，在於：「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議兵〉，頁 504）若能如此，則「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議兵〉，頁 504），而王者之事畢矣。

<sup>71</sup> 其詳參見〔清〕王先謙：《荀子集解·疆國》，頁 521-523。

## 五、結論

在歷史長河中，戰爭是改朝換代最常見之方式，然而當推翻前朝、兼併殘餘勢力後，各朝國祚短長差距極大。周長達八百多年，乃以推動禮樂教化而成就盛世，卒因禮壞樂崩而衰亡。秦雖贏得荀子「治之至」的美譽，終因無儒以為國本，僅 15 年而亡。周、秦對比，即可印證「以德兼人者王」之理。戰國晚期以武力掛帥，講求兵不厭詐之戰略技術運用，荀子能突破窠臼，在議兵之時不忘宣揚「以禮凝國」之根本，可惜不被當世注重功利者理解。

以下透過《漢書》〈刑法志〉對「王道之本」的概括，可視為荀子議兵說的重要回響：

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慙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sup>72</sup>

班固從人類歷史證明禮主刑輔、德威相濟之措施，乃效法天地自然而衍生的王道法則，必須兼而有之、缺一不可，然須明辨本末先後，不可違拗根本，以溫慈惠和之文德成就禮之教化功能，而以天雷地震、甲兵斧鉞等威武殺戮之刑坐收輔弼文德之效。空有完美學理，若無配套之實作措施，終歸是虛而不實的海市蜃樓幻影。任何一個國家或王朝倘無周詳之兵學理論與軍事制度，是無法長存於世的，因為此制度之設立，並非單單只為應付人類之戰爭而準備，更重要的，則是遭遇各種天災或突發之狀況時，都需要啟動軍事機制以作即時救濟之道。

【責任編校：林哲緯、黃璿璋】

<sup>72</sup>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刑法志》，頁 1079。

## 徵引文獻

## 專著

- 〔周〕管仲 Guan Zhong 著，黎翔鳳 Li Xiangfeng 校注：《管子校注》*Guanzi jiaozhu* 下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4 年。
- 舊題〔周〕呂望 Lü Wang 撰：《六韜》*Liutao*，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shushe，1993 年。
- 〔春秋〕左丘明 Zuo Qiuming：《國語》*Guoyu*，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ren shuju，1981 年。
- 舊題〔春秋〕司馬穰苴 Sima Rangju：《司馬穰苴兵法》*Sima Rangju bingfa*，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shushe，1993 年。
- 舊題〔春秋〕孫武 Sun Wu：《孫子兵法》*Sunzi bingfa*，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726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 年。
- 〔戰國〕呂不韋 Lü Buwei 著，陳奇猷 Chen Qiyou 校釋：《呂氏春秋校釋》*Lüshi chunqiu jiaoshi*，上海 Shanghai：學林出版社 Xuelin chubanshe，1984 年。
- 〔漢〕司馬遷 Sima Qian 撰，〔日〕瀧川龜太郎 Takigawa Kametarou 考證：《史記會注考證》*Shiji huizhu kaozheng*，臺北 Taipei：洪氏出版社 Hongshi chubanshe，1977 年。
- 〔漢〕班固 Ban Gu 撰，〔唐〕顏師古 Yan Shigu 注：《漢書》*Han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2 年。
- 〔漢〕趙岐 Zhao Qi 注，〔宋〕孫奭 Sun Shi 疏：《孟子注疏》*Mengzi zhushu*，收入〔清〕阮元 Ruan Yuan 審定，盧宣旬 Lu Xuanxun 校：《十三經注疏》*Shisanjing zhu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85 年。
- 〔漢〕劉向 Liu Xiang：《說苑》*Shuo yuan*，收入王雲五 Wang Yunwu 主編：《四部叢刊正編》*Sibu congkan zhengbian* 第 17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79 年。
- 〔漢〕鄭玄 Zheng Xuan 注，〔唐〕孔穎達 Kong Yinda 等正義：《禮記正義》*Liji zhengyi*，收入〔清〕阮元 Ruan Yuan 審定，盧宣旬 Lu Xuanxun 校：

- 《十三經注疏》*Shisanjing zhu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85 年。
- 〔漢〕鄭玄 Zheng Xuan 注，〔唐〕賈公彥 Jia Gongyan 疏：《周禮注疏》*Zhouli zhushu*，收入〔清〕阮元 Ruan Yuan 審定，盧宣旬 Lu Xuanxun 校：《十三經注疏》*Shisanjing zhu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85 年。
- 〔魏〕王弼 Wang Bi、〔晉〕韓康伯 Han Kangbo 注，〔唐〕孔穎達 Kong Yinda 等正義：《周易正義》*Zhouyi zhengyi*，收入〔清〕阮元 Ruan Yuan 審定，盧宣旬 Lu Xuanxun 校：《十三經注疏》*Shisanjing zhu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85 年。
- 〔魏〕何晏 He Yan 集解，〔宋〕邢昺 Xing Bing 疏：《論語注疏》*Lunyu zhushu*，收入〔清〕阮元 Ruan Yuan 審定，盧宣旬 Lu Xuanxun 校：《十三經注疏》*Shisanjing zhu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85 年。
- 〔晉〕杜預 Du Yu 注，〔唐〕孔穎達 Kong Yinda 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Chunqiu zuozhuan zhengyi*，收入〔清〕阮元 Ruan Yuan 審定，盧宣旬 Lu Xuanxun 校：《十三經注疏》*Shisanjing zhu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85 年。
- 〔晉〕陳壽 Chen Shou 撰，〔宋〕裴松之 Pei Songzhi 注：《三國志》*Sanguo z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2 年。
- 〔唐〕魏徵 Wei Zheng 等撰：《隋書》*Sui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2 年。
- 〔清〕王先慎 Wang Xianshen 撰，鍾哲 Zhong Zhe 點校：《韓非子集解》*Hanfeizi jijie*，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8 年。
- 〔清〕王先謙 Wang Xianqian：《荀子集解》*Xunzi jijie*，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88 年。
- 〔清〕王聘珍 Wang Pinzhen 撰，王文錦 Wang Wenjin 點校：《大戴禮記解詁》*Dadai liji jiegū*，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年。
- 〔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Siku quanshu zongmu tiyao* 第 3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65 年。

- 〔清〕郭慶藩 Guo Qingfan：《莊子集釋》*Zhuangzi jishi*，臺北 Taipei：貫雅文化 Guanya wenhua，1991 年。
- 〔日〕佐藤將之 Sato Masayuki：《荀學與荀子思想研究》*Xunxue yu xunzi sixiang yanjiu*，臺北 Taipei：萬卷樓圖書 Wanjuanlou tushu，2015 年。
- 于孔寶 Yu Kongbo：《稷下學宮與齊文化研究》*Ji Xia xuegong yu qi wenhua yanjiu*，北京 Beijing：中國戲劇出版社 Zhongguo xiju chubanshe，2010 年。
- 仝晰綱 Tong Xigang：《青銅的戰神——齊魯兵家文化研究》*Qingtong de zhanshen: qilu bingjia wenhua yanjiu*，上海 Shanghai：學林出版社 Xuelin chubanshe，1999 年。
- 沈文倬 Shen Wenzhuo：《宗周禮樂文明考論》*Zongzhou liyue wenming kao lun*，杭州 Hangzhou：杭州大學出版社 Hangzhou daxue chubanshe，1999 年。
- 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歷代人物年里通譜》*Lidai renwu nianli tongpu*，臺北 Taipei：世界書局 Shijie shuju，1993 年。

#### 期刊與專書論文

- 吳文璋 Wu Wenzhang：〈荀子〈議兵〉篇析論〉“Xunzi ‘Yibang’ pian xilun”，《成大中文學報》*Che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8 期，2000 年 6 月。
- 阮廷卓 Ruan Tingzhuo：《孔子三朝記解詁纂疏》*Kongzi sanchaoji jiegu zuanshu*，〈國文研究所集刊〉*Guowen yanjiusuo jikan* 第 7 期，1963 年 6 月。
- 周鳳五 Zhou Fengwu：〈讀上博楚竹書〈從政〉甲篇筭記〉“Du shangbo chuzhushu ‘Congzheng’ jiapian zhaji”，收入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Shanghai daxue gudai wenming yanjiu zhongxin、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 Qinghua daxue sixiang wenhua yanjiusuo 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Shangboguan cang zhanguo chuzhushu yanjiu xubian*，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2004 年。
- 林素英 Lin Suying：〈〈仲尼燕居〉、〈孔子閒居〉與〈論禮〉纂輯之比較：以〈民之父母〉為討論中介〉“‘Zhongni yanju,’ ‘Kongzi xianju’ yu ‘Lun li’ zuanji zhi bijiao: yi ‘Min zi fumu’ wei taolun zhongjie”，丁四新 Ding Sixin 主編：《楚地簡帛思想研究（三）》*Chudi jianbo sixiang yanjiu (3)*，武漢 Wuhan：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renmin chubanshe，2007 年。
- 陳青榮 Chen Qingrong：〈重新認識《六韜》的資料價值〉“Chongxin renshi Liutao de ziliao jiazhi”，《管子學刊》*Guanzi xuekan* 1993 年第 4 期。

陳青榮 Chen Qingrong :〈姜太公與管仲改革〉“Jiang taigong yu Guan Zhong gaige”,《管子學刊》*Guanzi xuekan* 1995 年第 1 期。

—— :〈《六韜》書名含義及時代信息〉“*Liutao shuming hanyi ji shidai xinxi*”, 收入徐樹梓 Xu Shuzi 主編:《姜太公與齊國軍事文化》*Jiang taigong yu qiguo junshi wenhua*, 濟南 Jinan: 齊魯書社 Qilu shushe, 1997 年。

陳連慶 Chen Lianqing :〈先秦儒家的演變及其有關問題〉“Xianqin rujia de yanbian jiqi youguan wenti”,《史學集刊》*Shixue jikan* 1987 年第 3 期。

楊朝明 Yang Chaoming :〈關於《六韜》成書的文獻學考察〉“Guanyu Liutao chengshu de wenxianxue kaocha”,《中國文化研究》*Zhongguo wenhua yanjiu* 2002 年第 1 期; 又收入楊朝明 Yang Chaoming:《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Chutu wenxian yu rujia xueshu yanjiu*, 臺北 Taipei: 臺灣書房 Taiwan shufang, 2007 年。

〔日〕武內義雄 Takeuchi Yoshio :〈兩戴記考〉“Liang Dai ji kao”, 收入江俠菴 Jiang Xiaan 編譯:《先秦經籍考》*Xianqin jingji kao*, 臺北 Taipei: 新欣出版社 Xinxin chubanshe, 1970 年。

#### 會議論文集

林素英 Lin Suying :〈《禮記》〈經解〉連續四篇之儒學思想發展: 結合戰國簡文與《荀子》之討論〉“*Liji ‘Jing jie’ lianxu sipian zhi ruxue sixiang fazhan: jiehe zhanguo jianwen yu Xunzi zhi taolun*”, 收入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 Zhejiang daxue guji yanjiusuo 等主辦:《「紀念沈文倬先生百年誕辰暨東亞禮樂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Jinian Shen Wenzhuo xiansheng bainian danchen ji dongya liyue wenming*” *guoji xueshu yantaohui huiyi lunwen*, 杭州 Hangzhou: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 Zhejiang daxue guji yanjiusuo, 2016 年。

#### 學位論文

周鳳五 Zhou Fengwu :《六韜研究》*Liutao yanjiou*,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Guoli taiwandaxue lishi yanjiusuo boshi lunwen, 1978 年。